

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示范教材
教育部特色专业重点建设项目

A COURSE IN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旅游人类学教程

龚锐 主编 郑向春 葛荣玲 副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示范教材
教育部特色专业重点建设项目

旅游人类学教程

A COURSE IN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龚 锐 主 编
郑向春 葛荣玲 副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孙延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人类学教程/龚锐主编.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637 - 1805 - 4

I. ①旅… II. ①龚… III. ①旅游业—社会人类学—教材 IV. ①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2075 号

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示范教材

教育部特色专业重点建设项目

旅游人类学教程

龚 锐 主 编

郑向春 葛荣玲 副主编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x@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 12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一

纳尔逊·格雷本^①

能为此书撰序,我深感荣幸。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向外国旅游者敞开大门,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大众旅游兴起,中国旅游业开始蓬勃发展。自此,中国的国内旅游逐渐发展成为世人所知的规模最大的旅游体系,中国的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呈现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态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于旅游业的研究日趋深入。首先是对于促进旅游经济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伸到了对旅游业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中国的旅游强调中国独特的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因此,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旅游形式。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者,还有外国旅游者,喜欢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那些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学者注意到大量的旅游者涌入部分他们所研究的社区并开始开展相关的研究时,旅游人类学便产生了。中外人类学学者都担心旅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旅游导致的传统民族文化的流失,例如语言、信仰、家庭模式、民俗、仪式、食物及其独特的烹调方式等,与此同时,人类学学者也参与了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从旅游中受益的行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人们在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技能以及经商技能方面与其他地区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谋生手段,减少因年轻人外出打工而导致的这些地区劳动力的流失。

旅游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是保护当地文化及社区的完整性,因此,旅游人类学学者必须既要研究当地的社区和居民,也要研究旅游者的文化和行为。另外,旅游人类学学者研究旅游时,必须设法了解包括政府和商人在内的各相关利益者以及协调机构,因为他们能够推动旅游的发展,促进旅游的规模化发展。旅游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领域既包括现代化的大都市,也包括农村;既包括位高权重者,也包括社会弱势群体;既包括利用现代交通工具旅游的人群,也包括沿袭传统方式旅游的旅游者。

旅游业是现代社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不仅能够使人们离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外出放松和休闲,还能够让人们有机会体验和探索异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① 纳尔逊·格雷本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旅游学科联合主席,终身教授。他同时还是国际旅游研究学会的创会成员,以及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学会始创会长。

因此,旅游不但具有疏通与教育功能,还能够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接触,使财富从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旅游使人们相逢,旅游能增加人们的相互理解,事实上,从国际社会的层面讲,“旅游是世界和平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在像中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旅游能提高民族自豪感,促进民族归属感。

人类学学者强调旅行经历的真实性,而不是去弱化当地文化或使其商品化。他们一直致力于推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特别是那些民族地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这能给当地人民提供一个了解和保护他们当地文化的机会,同时也能让游客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人类学学者还希望保护当地的仪式和舞蹈,哪怕他们只是为游客而表演的。在如今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人类学学者还要想办法促进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成功推行的民族旅游使得游客以及他们的财富和好奇心流入早先边缘和贫穷的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由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拥有了现代教育和技术。事实上,一些农村的少数民族,譬如珍妮·希尔研究的广西平安村的壮族,仿效汉族人的做法,也学会把自己当游客,穿着他们传统的民族服装组团去上海、北京旅游。这样做的同时还为他们村做了推广。

人类学的创始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所谓文化和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随着人类文化的改变和相互影响,人们愈加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我们把这种对文化的意识称为遗产。当今世界的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很在乎对自己民族和国家以及世界遗产的保护和鉴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遵照人类学家最早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分类,对有形和无形的世界遗产均给予认可。在大众旅游盛行和民族地区成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时代,专攻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学者已经充分做好了保护这些遗产的研究、了解以及提供相关支持的准备工作。

这本书是中国旅游人类学领域里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很支持这本书的出版。这些长期致力于各民族院校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院教学工作的学者,他们是当代中国旅游人类学的专家和中坚力量。我很荣幸与这些学者有联系并有幸为他们的新书写序。

序 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出现了快速成长的趋势,宣告大规模“大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大众旅游”的出现主要受到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的社会后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属性,即“移动性”(mobility);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现代移动性的产生加速了大众旅游的实现。移动性不仅改变了人的思维,改变了人的认知方式,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旅游无疑是这一新的社会属性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方式。80年代以后,旅游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旅游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与之相关的学科进入到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人类学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保持着学科上的特点,即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异文化”(other culture),重视对“他者性”(the others - ness)的观察、了解和分析。因此,旅游人类学也把理解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他者性”当做核心问题来对待。然而,旅游人类学研究在开始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主要原因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以来,欧洲的旅游属于极少数人的“贵族活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游也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范围。旅游“小众化”和非社会主体性,以及那时旅游所带的“奢侈轻佻”方式,一直不被“严肃的科学研究”所接纳。

这种情状很自然地反映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旅游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几乎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年轻和晚近的,这除了以上的理由外,“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也是人类学发展到近代才在学科范围内逐渐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旅游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范畴。所以,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晚期才出现。按照旅游人类学家纳什(Dennison Nash)的说法,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鲁尼斯(Nunis)于1963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著名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Nelson H. Graburn)则认为,真正的旅游人类学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因为那个时代也是旅游正在成为世界上主要工业产业一部分的历史过程,旅游在社会发展中也才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很晚,但它一经形成,就表现出声势大、学科特色鲜明、研究品质特殊的特点。

可以说,现代旅游肇始西方,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相辅相成,学科和研究上也反映出这一点。所以,迄今为止,较成气候的专业性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西方国家,特别在北美和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但是,越往当下,发展之势也越

出现“全球化”,比如今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蒸蒸日上,呈现出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态势。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无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旅游,还是旅游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旅游人类学都将旅游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行研究。纳什就此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1)旅游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研究正是人类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2)在人类社会,旅游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类活动,它在复杂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表现。

(3)旅游是“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现象和因素。

此外,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两种鲜明的特性,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逻辑性的旅游人类学也因此具有这两个鲜明的特征。基础研究包括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比如“他者性”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东道主社会的结构以及变迁,旅游人类学方法论问题等。与人类学理论一样,相关的问题都属于基础研究的范围。同时,应用研究也是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鲜明特色,事实上,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就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旅游人类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整合。旅游人类学研究会主动吸纳相近或相关学科的成果;在对待不同问题时,也会有意识地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以丰富人类学学科的研究手段,扩大分析视野。

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遵循着两个基本原则:①人类学的旅游研究已经呈现出独树一帜的学科优势,即兼顾旅游的短、中、长线的整体研究;不仅观察旅游行为以及与旅游有关的包括行政、管理、资本、规划等具体行为,更关注旅游给人们,尤其是东道主社会所带来的中、长期的影响,还关注旅游给生态带来的后果等。②特别关注东道主社会性族群的长远利益,人类学家甚至置疑旅游可以给落后地区的民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旅游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旅游人类学通常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相当谨慎,而且经常与行政管理部门“唱反调”。

在方法上,人类学商标式的方法是“田野作业”,即以参与观察为基本手段,了解并全方位地描述观察对象。这使得人类学家们在旅游研究中可以通过这种对案例的实地调查,继而对东道主社会作细致的研究。这是民族志者(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特殊身份和工作)最起码和基础性的工作要求。同时,人类学实际上是从从事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跨文化比较”(cross - cultural comparisons)的研究工作。比较的方法也是惯用的。同时,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的开放态势,致使其自觉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诸如社会学统计的方法、社会分层的方法、经济交换的方法、地理测量的方法、历史学中常用的历时性方法,甚至政治权力分析的方法等。

旅游人类学在今天仍属于“新兴学科”的范畴,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拓展:①加强学科的研究力量,使更多的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相关或相近的学科同行加入到对旅游的研究行列。②出现更多、更扎实的有关旅游方面的民族

志,为深入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实在、更具体的“原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而成熟的旅游人类学的理论。③需要对旅游过程有一个更宽广、更具有平衡性的包容和覆盖,特别需要具有专业性和专长性的整合和平衡。④提升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理论水平,体现旅游人类学的“两栖性”:理论性和应用性。

作为新兴学科,旅游人类学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之一,对象上,传统的民族志范式通常是对一个固定的社区进行研究,而旅游的移动性质使传统的研究面临困难。

之二,学理上,传统的人类学是在具体案例中寻找“语法”的工作,而旅游基本上属于“物化性”,如何在其中寻找到“物理性”,是一个难点。

之三,方法上,传统人类学的质化研究讲究整体性。要把“食、住、行、游、购、娱”融于复杂的社会体系和语境,把日常琐碎事务与学理性置于一畴有赖于方法上的创新。

我国的“大众旅游”只有30多年的历史,即从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群众性旅游活动算起。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基本上是从介绍西方的学科成果开始的。1996年,申葆嘉在《旅游学刊》上连载“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第一次在中国使用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此后一批人类学者和旅游学者进入到了这一领域,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出现了一批成果。这一学科显然已经开始与国际研究进行对话与对接。我国旅游人类学的一些主要话题和问题也与国际同步并趋,包括:①旅游、殖民和怀旧;②旅游和真实性;③旅游、符号和结构;④旅游、仪式与宗教;⑤旅游、商品化和全球化;⑥旅游和遗产;⑦旅游和性别研究;⑧旅游和景观;⑨旅游与社区参与等,在民族旅游研究方面甚至已经呈现出了中国特色。

我国高校也以开放的姿态接纳这一新兴的学科。在许多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民族院校,纷纷开设了旅游人类学(旅游民族学)的课程。这说明,旅游人类学已经进入到旅游的知识谱系中。本教材正是这一学科开放态势和积极过程的一部分。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在旅游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更希望它能够与新的社会属性相适应、相配合,成为社会知识谱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是为序。

彭兆荣

2011年中秋节写于厦门大学

序三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旅游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 30 多年间,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从早期的单纯的旅游经济研究,发展到了涉及不同领域多学科的研究。旅游管理也不再是旅游经济管理的代名词,而是涉及了多个领域的综合性的学科,成为一门特殊的管理学科,其中包括有微观的管理和宏观的管理。就微观的层面而言,诸如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人力资源管理等等,但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如人文资源的管理、生态的管理、社会文化变迁的管理以及旅游者的管理,等等,这一切,远远超越了经济管理的内容,正如《旅游百科全书》的主编 Jafar Jafari 在该书“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最大产业。通过旅游,人们可以纵横世界,跨越没有连接的通道,走进无标记的山谷,发现从未被人们关注的处女地,遇到背包客和探险者。”但是,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许多由此引起的新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旅游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特别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为此 Jafari 指出,这些问题是“埋藏在经济层面下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更值得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产生的新兴学科——旅游人类学,正是站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以全景式的视野和高度,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些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还打破了早期的单一的旅游经济研究的疆界,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丰富了旅游学的研究内涵,使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市场营销学、酒店服务学、休闲学、管理学等交叉融合,对当今世界旅游研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旅游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旅游业开发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轨迹,那就是:旅游业开发一开始都是从经济的目的出发,但到了一定时期,人们就会发现,旅游业的开发对东道地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似乎已形成了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旅游业的研究,从单纯经济的观点上升到了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也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些问题在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引起了西方人类学家的注意。他们发现人类学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并把这种发现称为“如获珍宝”。诸如:人为什么要外出旅游?其目的和动机到底是什么?旅游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人类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而旅游人类学的产生,为破解这些问题作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理论诠释。旅游人类学不再被看做是“另类”,旅游人类学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其实,从字面上来理解,旅游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研究旅游——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以及

由此引起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这也表明,善于观察和捕捉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事物是人类学家所具有的“素质”和“灵感”。凭着这些“素质”和“灵感”,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内容扩大到了对旅游——被他们称为“人类探索行为”的活动的研究当中。就研究方法而言,人类学家们强调实证研究,他们用被称为“民族志旅游”的方法,到世界不同的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和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诠释所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写出了具有理论和实证意义的论文和论著。这再次证明,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学科。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比西方晚了约20年,但当旅游业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同样出现了西方国家旅游发展出现过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用“旅游人类学”几个字来描述,但我国有些学者已开始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进行了一些研究,特别是1999年9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会议,拉开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正式序幕。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都会出现一些共同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以前所没有出现过的,例如旅游业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旅游业开发与遗产旅游的关系;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等。这些问题是我们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多元化的、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所以,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观察,不断探索,探寻出旅游业合理发展的途径,是人类学家们和所有关心旅游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们的共同使命。旅游人类学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被引进中国之后,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产生了许多学术论著,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对旅游研究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年轻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者,在认识和接受了这一新兴学科以后,大胆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新的理论观点和反思,虽然有些观点还不太成熟,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现象,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旅游专业或人类学专业已开设了“旅游人类学”课程,并成为了专业的必修课。因而,编写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旅游人类学”教材已势在必行。由贵州民族学院龚锐教授主编的《旅游人类学教程》教材在这个时候出版是非常及时的。这是一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根据旅游专业学生的需要所编著的结合实际的教材。这本教材从体例安排到理论研究和案例探讨,都经过了精心安排和设计。相信这本教材的出版,一定能使旅游专业的学生较好地学习、理解和掌握旅游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有助于把这门学科的理论充分运用到旅游开发的实际案例研究当中。我们期待这本教材的出版为大中专学校培养出更多的旅游人才和致力于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总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在中国前景广阔,但任重而道远,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努力。

张晓萍

2011年5月21日

于春城昆明

目 录

《旅游人类学教程》导言	1
第一章 旅游人类学概述	9
第一节 人类学视角与理论的引介	9
第二节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背景与内容	18
第三节 旅游人类学研究概况	25
第四节 旅游人类学的学科方法与意义	31
第二章 仪式与旅游	39
第一节 人类学仪式理论引介	39
第二节 朝圣与旅游	45
第三节 纳尔逊·格雷本及其旅游仪式论	49
第三章 探寻旅游中的“真实”	59
第一节 旅游中的“真实性”理论	59
第二节 旅游中的真实性研究	65
第三节 旅游的“商品化”(Commoditization)	67
第四章 旅游中的族群认同	76
第一节 少数民族旅游	77
第二节 旅游中的族群认同	83
第三节 纪念品作为族群认同的标示	87
第五章 旅游中的社会性别	98
第一节 旅游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概述	98
第二节 旅游中的性观光	102
第三节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社会中的女性	103
第四节 民族旅游从业者的社会性别差异	109
第六章 旅游中的符号体系	120
第一节 符号理论引介	120
第二节 旅游景物的符号学与符号叙事	125

第三节 旅游消费中的符号指喻	135
第七章 游客的凝视与体验	143
第一节 游客的凝视	143
第二节 游客的体验	150
第八章 旅游中主/客间的遭遇与互动	160
第一节 主/客间的遭遇与互动	160
第二节 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涵化与变迁	164
第九章 旅游与遗产	174
第一节 遗产的传统性与归属感	174
第二节 旅游与遗产的关系	178
第三节 如何在旅游中“消费”遗产	181
第十章 旅游与博物馆	193
第一节 博物馆概说	193
第二节 全球化、旅游与博物馆	196
第三节 旅游: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207
第四节 博物馆旅游的问题与压力	212
旅游人类学的展望	220
后 记	228

《旅游人类学教程》导言

一、困境与选择

中国旅游本科教育当下尴尬的境遇似乎已成为业内及学界热议的话题。“学术水平不如研究生,文化功力不及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操作能力又赶不上高职生、专科生。”甚至有的学者及业界人士一度形容旅游本科教育的此种困境为“鸡肋”。

倘若我们更为理性地对这种“鸡肋”现象作一个全方位的观照,不难发现本科旅游教育遭遇尴尬的背后,事实上潜藏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是该学科建设的严重滞后,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学科的独立性差。我们知道旅游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诸多地区的支柱性产业,然而旅游学科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地位却极其低下,类似于二级学科寄生在其他学科中。其次,整个学科理论独立性不强,导致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学科课程设置不完善,倚重倚轻,又导致与行业脱节明显。更要命的是,在各高校旅游本科教育现行的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上普遍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重理论、轻实操的情形。邹统钜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旅游仅仅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观念在国外早已被抛弃了,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环境学,包括经济学等多学科看待旅游现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作为产业,旅游的创汇与经济收入远远不能够同制造业相比,但它对扶贫、社区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弱势群体就业、文化交流、生态环境改善、全民素养提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见,无论是从文化经济现象还是从产业角度来看待旅游,事实上,旅游都具有极强的学科综合性。因此,时下困扰旅游本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病灶之一似乎凸显出来,即是学科建设中的课程设置与旅游本身的偏离。

这里有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需要厘清。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协同性越来越强,旅游中的文化因素日益彰显,文化与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文化是旅游的核心与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的理念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对此我们仍然有强烈的阐释诉求。

旅游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有之,游历名山大川,浪迹江河湖海,探索秘境幽地,感受大千世界,历来是人类自身成长过程的追求,而现代旅游则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应运而生的。尽管现代旅游形式多种多样,旅游内容丰富多彩,但主要体现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品味文化内涵,感受文化魅力。现代人都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灵魂。将文化看做是旅游的灵魂,实际上是回归了旅游的本原。

文化是人文景观的魅力之源。人文景观是人类生产、生活积累和遗存的艺术化成果和结晶。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景观因文化而璀璨,因文化而留存。壮丽的故宫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当初作为皇家宫殿的建筑和前工业时代皇权象征的意义,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和

古老中国灿烂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甚至体现着我们国家悠久的传统哲学。布拉格、威尼斯、巴黎卢浮宫、敦煌莫高窟等分别因为音乐、电视或艺术品而成为世人所景仰的文化旅游胜地。

同样,文化是自然景观的精气神。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庐山韵味悠长;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使桂林喀斯特地形地貌有了灵气,引得游人流连忘返;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得西湖游人如织。由于有文化的滋润,自然景观因此而灵动,或秀美隽永,或威武雄壮,让自然景观魅力倍增,更加妩媚迷人。

从旅游体验层面上看,旅游过程实际上是文化的体验和享受。因之,文化需求是旅游的根本动因。大家知道,出行旅游有物质需求,但更深层次的则是精神文化需求。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人们参观历史古迹,游览名山大川,体察风土人情,时刻都在触摸文化脉搏,感知文化神韵,汲取文化营养。人们到北京,登长城、看故宫,就是在品味中华文化的悠久与醇厚。人们去海南,游历天涯海角,领略椰岛风光,最令人回味的其实是天人合一的心灵感悟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可见,旅游者出行最大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情趣和精神的愉悦,异质文化圈中熠熠闪光的文化特质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吸引旅游者的出游动力。

有人曾经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理想中的旅游终极目的是什么?”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异域空间,主客之间,换句话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等互动,相互尊重,以敬畏自然的态度去感悟天地之灵气,从而获得畅美与愉悦,体会到和谐与休闲,感知到生境多样性的价值以及文化多元的意义,应该是理想中的旅游终极目的。因之,人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感受,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的声誉。文化环境、社会秩序、服务质量,给人留下的印象有时比秀丽的风光还要深刻。很难想象一个缺少好客文化、环境脏乱、治安无序的地方,能够成为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而文化的力量则足以改变这一切。另外,旅游作为跨时空的交往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自古以来,旅游就与文化的传播相生相伴。每一个旅游者,实际上是文化的传播者,是促进沟通交流的文化使者。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旅游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展开,必然会促使各种文化的互相融通,展示人类文明的多姿多彩,文化交流、文化认同、文化互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今后旅游发展的必然方向。

最后,文化是推动文化旅游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推手和核心力量。历史遗迹、文化遗产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社会文明的瑰宝。在保护中开发,在利用中保护,是文化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基本前提。因此,当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设计旅游项目,开展旅游活动时就必须用文化的尺度考量资源的承载力,做到合理、适度,实现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的良性循环,建构起旅游依托文化,更要反哺文化共同发展的理想模式。

令人遗憾的是,时下中国高校的各旅游本科院校设置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学课程的院系微乎其微、少之又少。大多数院系仍然沿袭着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故而,出现本科教育“鸡肋”现象便在所难免。

在困境面前和遭遇尴尬之时,我们选择了突破与超越。本教程正是着力于旅游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上的一种尝试。我们试图通过在本科旅游教学中融入“旅游

人类学”的讲授,为旅游专业的本科学子全面、科学地认识旅游打开另一扇窗户,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提供一种崭新的理念和方法。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本教材传递出这样一种学术命题,即将文化融入旅游,事实上是回归了旅游的本原,文化是旅游的核心与灵魂。

二、从异域到本土

“对于遥远的他乡,人类学家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他们渴望了解异域未知的神秘世界,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痕迹,以此反观自身的文化,或者从异域他乡的文化世界中建立人类文化的普遍模式,达成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人类学家的文化抱负。”^①当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忧郁的热带》中发出人类学家试图参与到对旅游活动进行观察与研究的诉求之时,在西方,事实上人们仍然关注的是旅游能给当地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严格地说由人类学家所进行的严肃的有关旅游方面的研究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期。“1963年,人类学学者鲁尼斯(Nunis)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学者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②

事实上,人类学家对旅游的早期关注与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的,理论研究相当少,他们倾向考虑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到底是益是害这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人类学家之所以持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对于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特别是对那些在旅游目的地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行为的憎恶。随着现代旅游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使旅游人类学对旅游行为的研究着眼点,渐渐从揭露事实的真相转变为对旅游负面影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论上。而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涉及的是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方面的问题,因此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相应集中到了这个领域,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成果;同时,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突破也集中在这里。

旅游人类学认为,现代旅游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充满了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如接待地社会文化商品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退问题,“伪民俗文化”的泛滥;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使当地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和家庭的传统凝聚力减弱;与此同时,由于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使接待地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动摇着接待地社会的整个基础;由此而引发了旅游人类学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激烈争论。如“哈莱尔·邦德(Harrell Bord,1978)在《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冈比亚的旅游和发展》一文中,对由外界刺激和外界导向引发的经济发展提出疑问。卢基西斯(Loukissons,1978)在《旅游和环境的冲突:以希腊马可纳斯岛为例》中指出,旅游使该地区环境急剧恶化。皮·桑亚(P. Sunyer,1977)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区的大众旅游,认为它强化了陈规陋习。努尼斯(Nunis,1977)对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快乐化’现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格林伍德(Greenwood,

① 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王志明译. 上海: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0. 第55页。

②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第1页。

1977)在《切开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他认为旅游使巴斯克地区阿拉德节日仪式商品化了。这一节日仪式深受当地人们喜爱,凝聚了许多当地传统文化。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是他无法忍受的”。^①

与上述论点针锋相对的是“麦基恩(McKean,1976)对巴厘岛,科恩(Cohen,1979)对泰国,波斯维恩(Boissenvain,1978)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Mansperger,1981)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他们认为旅游是良性或者有益的发展途径。”^②

旅游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这就是1977年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旅游者——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自此,人类学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领域内的研究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以前和后来都有人提到,但是首先以一本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包括15篇文献,分别讨论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的架构问题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行为的个案,以反映可能成为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学科分支的构想和框架的,就是该书。“该书被旅游学术界的《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③

史密斯“里程碑”式的著作成就了旅游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也使得新兴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更加明确,即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旅游者及旅游本身的研究;二是旅游业的出现和发展给东道国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和研究。后者显然还包括了旅游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前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旅游者?他们的旅游行为和动机是什么?不同的需求产生了哪些不同的旅游方式?这些问题涉及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化变迁、文化拒斥、文化互动、族群性、全球化、地方化、迁移、现代性、宗教、法律等。人类学家认为这些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旅游的意义以及旅游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迁。

旅游人类学对后者的研究即旅游业给东道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传统文化;旅游与商品文化;旅游与民族工艺品的开发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重建问题;旅游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旅游与宗教的关系;旅游与性别角色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问题等。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应用人类学的迅速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者也在不断壮大和成熟,以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的教授群体成为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格雷本(Nelson Grabur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著名旅游人类学家。他在分析旅游现象时,提出了首先要了解与人类学有关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他在对旅游业的研究中,以旅游者的身份,结合自己对土著民族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民族志旅游。即旅游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要深入村寨部落,调查研究他们的社会与文

① 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1(3)。

② 张晓萍.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4页。

③ 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连载之二).旅游学刊,1996(2)。

化,发现他们的社会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巨大变迁。格雷本在为《无包装文化》一书所写的序言和《民族旅游艺术品的再思考》等论文中,深刻分析了现代化的旅游业给东道国与接待地区的艺术品发展带来的变化、转型及新的整合。他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及大洋洲地区旅游与文化发展》,深刻地阐述了现代化与地方文化产生的碰撞、涵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转型;阐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产生以及保持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此外,格雷本在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现代化和怀旧》,《旅游,休闲以及博物馆》等论文当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从事旅游业的目的、动机、行为,以及旅游业与现代化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其论点十分深刻、精辟。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另一先驱是史密斯(Valene L. Smith):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其代表作便是前文所提到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事实上这本书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书本。该著作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旅游业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①旅游本质的定义;②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③旅游业在不同社会中的发展;④从理论角度对旅游业进行研究。史密斯所编著的另外一些论文如《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业:一种帝国形式》,《从人类学角度谈旅游商品化》,《朝着理论的方向研究旅游业:巴利的经济双重性及文化的进化》等,成为旅游人类学的经典文章。

另外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敬重的旅游人类学家,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马康纳(Dean MacCannell)。他编撰了不少有关旅游人类学的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为《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理论》。该书分析了作为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旅游目的和行为,即他们去旅游,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文化经历,而在这种寻求过程当中碰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真实性问题。东道地区为吸引旅游者而设计了“舞台真实”,即设计所谓的旅游文化产品,以此来迎合各国游客,这对传统文化是破坏呢?还是保护?马康纳从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和注意。该书体现了这样一种主题思想:不同的旅游者对文化的真实性存在不同的要求;因此“舞台真实”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起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争论。马康纳对“舞台真实”的深刻批判有着独创的理论和观点。

马格丽特·丝旺(Margari B. Swain):美国人类学家,专门从事旅游业与旅游艺术品,旅游与性别的关系等研究。她曾长期在中国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重点研究旅游工艺品及人们性别在旅游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著有论文《民族旅游在中国云南省石林彝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艺术品开发中的女性角色》,《国家主义:石林的旅游和少数民族政策》等,这些论文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保护;当地居民的态度及价值认同;女性在旅游商品生产中的角色;国家主义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及国家力量与民族文化间的冲突等。

与格雷本、史密斯以及丝旺相比,纳什(Nash, 1996)则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更加客观地审视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他在其代表作《旅游人类学》一书中,从旅游作为发展和文化趋同,旅游作为个人转型以及旅游作为上层建筑的形式三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旅游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结合田